

读 译 文 丛

日 知 漫 录

李长声著

中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知漫录/李长声著. —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8.9

(读译文丛/赵武平主编)

ISBN 7-106-01334-X

I. 日… I. 李…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N.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11728 号

日知漫录

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

北京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8.75 插页:2

字数:204 000 印数:1—3000 册

1998 年 11 月第 1 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106-01334-X/I·0179 定价:15.60 元

目 录

自序	I
周恩来的日语水准	1
中国的天下第一和日本的独一无二	9
中国乎 支那乎	14
大韩与大和	19
当大学教授的方法	26
自行车文化序说	33
企业能成为文化的赞助人么	40
漫画只当它漫画?	47
日本人脑内闹革命	54
日本企业界的教祖	57
没有意思就走人	59
为战胜癌症干杯	61
东洋医学的复兴	63
漫说一个三角锥, 出版的	66
从音读到默读	72
活字消亡 书本长存	82
书·读书·读书史	88
为出版社作嫁	95

招来还是吓走	98
校对的终结	101
好书易尽，欲购从速	104
一本不卖也赚钱	107
日本出版业是东京的地方产业	110
出版行业“失乐园”	113
旅游及其文学与出版	120
角川其人及其商法	124
下个世纪书“迷你”？	133
全集故事多	135
日本稿酬古今谈	143
对谈·鼎谈·座谈	148
书评的蒙面杀手	152
斩书斩人	155
作家救济法	157
为有悼词存千古	160
文学里的歧视	163
重赏之下出文学	169
作家本是旧书商	178
大江健三郎获奖之后	183
远藤周作的狐狸庵	193
钓遍世界的开高健	196
三岛由纪夫故居	199
濑户内寂听与《源氏物语》	202
中上健次的胡同	205
松本清张的书库	208

司马辽太郎的读法	211
井伏鱒二的推敲	214
北杜夫的躁郁	217
川端康成的沉默	220
安部公房的沙漠	223
井上靖的漆胡樽	226
文学奖与现代文学史	229
日本文学小史	237
编后记	赵武平 271

周恩来的日语水准

先引书。

一是周作人的《知堂回想录》：“听说夏穗卿钱念劬两位先生在东京街上走路，看见店铺招牌的某文句或某字体，常指点赞叹，谓犹存唐代遗风，非现今中国所有。”

再是梅棹忠夫的《对论“探究日本”》，此话是那位与他对话的中国学者说的：“从中国初次来日本访问的人，看见街上的麻雀店招牌，‘呀，日本卖麻雀的可真多呀’。”

麻雀，麻将也，这本是中国的叫法，也略作雀牌，但现今有幸走上东京街头的中国人，却当它是“四害之一”了。两则逸事，时间有先后，后者不要说指点唐代遗风，连“我大清”的玩艺儿也闹不清楚了。

麻将的历史，能追溯到唐代的叶子戏，现在流行的游戏规则据说是光绪年间宁波秀才陈鱼门改进的，那时定名为“麻雀”。“麻将”的叫法反倒更古老，是形成于明熹宗天启年间的“马吊”的别名。改“将”为“雀”，或曰码牌如家雀展翅，或曰洗牌如家雀唧唧喳喳，确乎传神。

一九〇五年，李鸿章在马关挨枪子儿也过去十年了，日本的中学教师名川彦作受聘到四川资州师范学堂教授英文。五年后归国，带回一副雀牌，于是，在一味被过高地评价的明治维新之后，中国可算又有一样文化传入日本。虽然这次日本在输入中华

文化上难得地落在欧美的后面，但那玩艺儿到底是汉字的，很快就让不通风雅的“鬼畜”们自愧弗如。

一九一七年消闲生编写《麻雀详解》，出版于上海，可见雀牌先已在日侨中流行。一九一八年，从中国归来的麻生雀仙组织第一个雀牌俱乐部，叫“雀仙会”。一九二四年，侨居上海的井上红梅也写了一本《麻雀打法》；两年以后，他开始用心移译《狂人日记》《药》等小说，大概是第一个译介鲁迅的日本人。一进昭和时代，日本便出现第一场雀牌热。一九二九年成立日本麻雀联盟，总裁是文坛领袖菊池宽。这个联盟制定统一规则，确立段位制，排除赌博性，倡导礼仪，大大推动了雀牌的普及。最近翻阅《文艺春秋七十年史·资料编》，其中逐年影印了《文艺春秋》杂志目录，见昭和四年（一九二九年）刊有《麻雀学漫谈》，五年至六年连载《麻雀讲座》。传闻当今日本玩麻将的人多达两千万，乃至西非某国的教科书把日本人记述为“一天到晚打麻将的人们”。这可能是当地人从援助人员的寂寞生活中得到的印象，但日本上班族确实很喜爱围桌筑城，理由，说是这游戏富有亲和性。

百余年来日本很少从中国拿来语言了，似乎唯有这雀牌用语是例外。看他们玩得兴高采烈，嘴里发出的不是古音、吴音、汉音、唐音，而是现代音，就像说欧美外来语，怪里怪气，别有一番情趣。要是教他们说中国话，从一二三四、东南西北开头可再好不过了。

由麻雀之多少，想起李欧梵的话，但不记得他是在哪里说的了，大意是来到外国，才痛感本国文化修养之不足，不得不补课。这确是经验之谈。年轻人到日本留学，往往嘴一张就比较中日，算计着起码省一半工夫，但真的搞下去，问题反而常出在对

本国文化的把握上。

八十年代以来中国人络绎东渡，那些得风气之先的人已相继从学校毕业，而且，一个历史时机让他们撞个正着——日本又“归亚”了。“归亚”或“脱亚”，是照搬日本的字面，容易让中国人望文生义，理解得过于天真或肤浅，但怎样意译才好呢？日本在经济军事实力还说不上多么不得了的年代，竟一气搞了两场忘恩负义战争，所以一听说“脱”呀“归”的，难免不教人有点疑神疑鬼。这样忽而装孙子，忽而当老子，除了思想文化如日本者，怕是任谁也做不来。总之，这日本正在由低三下四的“隶美”转入趾高气扬的“还亚”（可以联想为“还乡团”的还字），起码要当个“头雁”。于是，书店里有关中国的书籍日增其多，当中颇有几本中国留学生撰写的博士论文。一代学人群立日本，有所成就，俨然指日可待了。

有关中国的图书大致可分作两堆，一堆是日本人自己写的，间或有其他国家的人写的，另一堆是中国人自己写的。后者又分成两小堆：翻译中国出版的，和直接在日本出版的。从销路来看，引人注目的是经济类，较为站得住的是历史文化类，卖不掉的是文学类，近来走俏的是风水类。翻译书往往失败在读者对象上，例如一本关于道教的知识读物，在中国属于下里巴人，译作日文，被装帧成阳春白雪，在书店的架子上很显得高不成低不就。直接在日本出版的书，大都赶行市，五花八门。中国人本来有一种出书情结，恰好日本出版业发达，于是由编辑操作，演出着是中国人就能写中国事的喜剧。甚至有的书籍，一读即知是出自某些研究人员之手，署名的著者，恐怕充其量是会说日本话的译者，这类合作则演示了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游戏规则。

书出得多了，便也应时读过几本。朦胧有一种感觉，觉得某些国人像是在那里做“二花脸”。

随便谈两本书。

其一是《中国人と中国系人》，河出书房新社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刊。内容似主要取自著者的另一本书，逐省区讲说中国的风土人情，教给日本人如何与中国人打交道、做买卖。著者自言“长达十五年致力于调查中国人的思考性、国民性”，但拜读之后，简直要疑心他不过在糊弄洋鬼子。笔者是土生土长的吉林人，所以只说这吉林。

书中说：吉林出身的上司，“帮派”观念强，善于拉帮结伙。往往工作完了也不直接回家，请部下吃喝。

说吉林的女性，至今还有“笑贫不笑娼”的说法，也意味着吉林打过去这样的女性就多。她们大手大脚，结了婚必须由丈夫掌管家计。

说因为有“吉林是东北首府”意识，与黑龙江省、辽宁省对抗的心很强。在吉林人面前切忌说奉天、哈尔滨。

这哪里是什么“用新眼光把握中国人日新月异的变化”，莫非在介绍满洲国时代的“新京”？记得前些年吉林有“南看辽宁、北看龙江”的顺口溜儿，但那不是要对抗，而是看左邻右舍如何动作，免得站错队或跟不上形势。吉林人（乃至东北人）嘴上功夫不行，爱动手，倒真是全国出名，例如本人，读了这派胡言，就很想给他来个“五把抄”哩。

再是《日本见闻录》，白帝社一九九二年十月刊。其中谈到日本的忘年会和中国的新年会。所谓“忘年会”，大概我们中国人立马会想到“忘年之交”的忘年，查一下日本最权威的辞典《广辞苑》，原来日语的意思是年底大家聚到一起喝两杯，忘却这一年的劳苦。然而，著者偏要把它说成“忘过会”，即开个会，把一年来所有的过错都抛到九霄云外，以不曾有任何“前科”的

心情迎接新的一年。这种忘记，而且是加害者和受害者双方一三，一起忘个干干净净。

著者强作解人，更引出一通宏论：“对于日本人来说，时代不是长的连续，而是一个个短的段落集合。不是长的实线，而是长的虚线。一个时代结束，下一个时代就把它前面的时代彻底切掉，什么‘过去’也不留地重新开始。这种事只有日本人才可能。”匪夷所思，这么一来日本历史岂不是像兔子一样跳跃，或者像一串香肠似的断断续续？这种事，鬼才做得到。

而中国人呢，著者说：对于中国人来说，时代不是长的虚线，而是长的实线。过去联着现在，现在联着未来。儒教的静止价值观从小自自然地浸透全身，所以中国人认为恒久不变是对的，变则不好，等于变的忘当然也不好。

项庄舞剑，意在“周公”，著者点到了周恩来——“虽然他年轻时留学过日本，一定知道日本人一到年底必开忘年会，但终究不明白忘年会的真义”，以至一九七二年日本总理田中角荣访问北京时，田中对周说：“忘了过去吧。”周猝然变色，答：“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闹得大家不愉快。

著者说得兴起：

两国邦交正常化的时候，似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不明白中国人的时代观，而周恩来总理也不明白日本人的时代观。田中角荣总理大臣把和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会谈当作日本人和中国人的“忘年会”了，说出“忘了过去吧”。但他错了。他不知道中国搞新年会，不搞忘年会。周恩来总理则把和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会谈当作了中国人和日本人的“新年会”，一听田中角荣总理大臣说“忘了过去吧”，就顿时误解为日本人从此不再对自己过去的罪行负责，说出“前

事不忘，后事之师”，予以警告：绝不允许日本从此不再对自己过去的罪行负责。

日本人总想把自己过去的罪行忘掉，但多数中国人心里认为，那可绝不允许。这是个大误解。这个大误解来自两国民众的时代观的不同。好好想一想日本人的忘年会和中国人的新年会的不同，这种误解不就比较简单地化解了么。

轻轻巧巧，得意之状可掬。大概这里的“中国人”还可以换作“亚洲人”，特别是韩国人，不知他们是过“新年会”还是“忘年会”，反正好像比中国人更“误解”了日本人，纠缠不休。

笔者身为中国人，虽并非如著者所言，把田中角荣“视为恩人”，即便犯了罪，也认为“罪人和他之间也毫无关系”，但过了不少的新年会，也过了更多的忘年会（日本人多是以小圈子过忘年会，每到年底都要忙着过好几个），却无论如何也体会不出著者赋予忘年会的“真义”，即“日本人总是不咎别人过去的失礼或过错，而且将其忘却，把过去和现在之间划上段落，但中国人却很难做到”。

著者所说的“大误解”根本不存在。日本人或许很希望别人不咎自己过去的失礼或过错，而且将其忘却，但问题是他们本身并没有好好把过去和现在之间划上段落，弄得中国人乃至亚洲人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早都说烦了吧。

中国给日本当了千百年的老师，到头来是一再挨打，就此来说，日本人好像确乎很善于划段落，把过去置诸脑后。但战后五十年，日本已开了五十年的“忘年会”，却一直不肯给那场战争利利索索地划个段落。就说不久前拍板的“战后五十年国会决议”，主语暧昧，将整个世界又耍了一把，而先前第一大党自民党提出的草案，则更能帮人理解日本谚语“偷儿也有三分理”。

那草案有云：“在列强竞相对他国施行侵略性行为或殖民地支配的一个时期，我国也卷入其中，顾及本国的安宁，终于与许多国家交战。我们应该反省过去的这种战争，谦虚地接受那惨祸折磨了众多人们的历史教训。”因为拗不过搭伙的社会党，老大不情愿地加上“侵略战争”、“殖民地支配”、“反省”等字眼儿，便构成如此绝妙的填空文章。“忘年会”论者若以此立论，中国人乃至亚洲人可真是“误解”了日本。

在日本，确实有些人一心要让人们忘记过去的侵略战争，不过，不是大开“忘年会”，而是在教科书上做手脚什么的。同时，又像是怕人们忘记，一遇机会便翻来覆去搞“失言”——又照搬了字面；用中国话来说，应该是“大放厥词”或“信口雌黄”。

加藤周一在他连载于《朝日新闻》的专栏《夕阳妄语》中说过：日本的大臣或有力政治家有反复“失言”的习惯。两三年一度，一定有谁出来反复，是恒例，像是这个国家保守权力的传统。“失言”的内容有两种。第一种是夸张日本的长处和外国短处，不可一世。例如，说日本的教育程度高，而少数民族多的美国教育程度低。不过，不触及留美的日本学生多而留日的美国学生少这一点。这种“失言”是临场随想，没有一贯性。第二种是关于十五年战争，说那“不是侵略，是进入”，“大东亚战争的目的是正当的”，“南京大屠杀是编造”之类。从文部省“修订教科书”到许多政治家“失言”，明显地具有一贯的倾向。……日德两国的现状如此不同，让人想到取得政权之前的希特勒的运动是从既存权力机构外部发生的，与之相对，日本计划并实行侵略中国战争的势力则出自保守势力内部。日本保守政权“失言”的传统、德国极右人种歧视主义的延续、意大利右翼政党的抬头，也有着共同的特征，那就是重估日本军国主义、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的历史。关于半个世纪前日军行动的“失言”有必要翻来

覆去，是因为有欢迎“失言”内容的听者。曾允许歧视人种、侵犯人权、破坏民主主义原则的国民的“知的怠惰和漠不关心”，在这个国家也并非遥远过去的故事。

加藤所说的听者，人数甚伙。许许多多日本人素朴地接受一个诉诸直觉的感情逻辑：若承认那是一场侵略战争，当年为国捐躯者的遗族岂不是可怜。“战后五十年决议”闹得沸反盈天，即说明不愿清算过去的势力有多么强大，这是要让向来被教给左中右算术的中国人吃惊的。吃惊之余，对那些荒唐或幼稚的著书实在鼓不起掌来。

一个小钱也不给。

中国的天下第一和 日本的独一无二

以前写过关于筷子的文章，落笔先引了一首明人五绝。孰料，近读李嘉的《日本专栏》，其中有一篇《从筷子谈起》，起法竟一模一样。虽然心头不无“敢期杜甫是前身”的窃喜，但也明白这下子是难脱袭用之讥了。李嘉撰写“日本专栏”是一九六〇年代后半的事，每周一篇，在海外四十余家华文报章上同日掲載，十年后结集出版。谈古说今，内容之博洽，见解之独到，简直令人怀疑能否再有人把随笔日本论写得这么好，但恍惚记得武安隆、熊达云合编的《中国人の日本研究史》（此书堪为工具，是日本的六兴出版社于一九八九年印行的，可惜该社已倒闭，图书怕是大都绝版了）却未予提及。

李嘉写道：“十八年前，我从上海被派到战败后不久的东京，一位日本朋友请我在筑地的一家日本料理店里吃晚饭。跪在一旁殷勤为我们斟酒的年轻的艺伎，看到我自由而熟练地运用筷子吃鱼夹菜，颇为惊异地夸奖我这个外国人的手艺。我不愿意使这位天真的佳人困窘，只能很谦逊地回答说，我们敝国亦是习用筷子的。”

筷子本来是中国的发明，早得不知何时便传入日本。《古事记》记载，大物主神的妻子得知他是一条蛇，吓得把“箸”插进阴户自杀了。于是，筷子演变为日本的文化。日本筷子尖尖的，看他们吃鱼，只是用筷子啄来啄去，技艺确乎很高明。往事如烟，日本人以为这个世界上只有日本独家使用筷子，也不足为

怪。尤其那些天真的佳人，偶见《人民日报》“全是汉字呀”，蛮可爱的。

日本人爱吃荞麦面。中国研究家村山孚在新著《中国人的尺度日本人的尺度》里说到中国人对日本的误解：河北省一位局长访问日本长野县（日本的县相当于我国的省）。午间，主人请他品味当地的名产——荞麦面。局长大人举箸不能食，觉得被侮辱被损害了，怒发冲冠。因为在他那别梦依稀的记忆里，荞麦是贫穷农民用来充饥的。就是为了不吃这荞麦，我们的局长才出生入死搞革命，岂能大老远跑到这儿来吃他妈的忆苦饭！但这里只说这荞麦，可见中国也有的，头伏萝卜二伏菜、三伏闲来种荞麦，却被许许多多日本人以为是日本特有的食物。

人们常说日本得“天时、地利、人和”，战后实现了经济奇迹。天时，应说是被置于美国的卵翼之下，地利，应说是与中国为邻，而人和，即所谓“集团性”，并非为日本所独自。专攻中国哲学史的加地伸行在《沉默的宗教——儒教》一书中剖析得明白：儒教里没有欧美近代思想的个人主义观点，其道德论不是追求个人幸福，而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追求个体所属社会（家族社会、地域社会、国家社会等）的幸福，是“共生的幸福论”。看看亚洲四小龙，看看中国大陆，得其时也，那么日本的发展也奇不到哪里。麦克阿瑟这位给了日本人一个“战后”的元帅曾站在美国国会上，说日本人的精神年龄只有十二岁，恐怕许多山姆大叔也都是怀着这种心态，编造出耸人听闻的日本神话。

我们中国人被中华文化养成的，什么都老子天下第一，“最”遍世界，不“最”就浑身不自在，非来他几句怪话不可。而日本人，可能因为几乎没有什么东西起头压根儿当初就是自己的，甚至总在问日本人从哪里来，所以自觉不自觉地怀有一种“独一无

二”的情结。就像丹尼斯说的，“日本人过于把太多的东西认作‘日本独自的东西’了”。不过，他指说的是明治时代以后，至于以前千百年，这位英国佬帮着日本人一古脑都认作日本的。

丹尼斯是牛津大学博士，在日本几所大学执教三十余年，日本文化终于未能将他同化，走人之前，写了本《被忘却的国度日本》，拿近现代文学开刀，把明治以来起劲儿西化的日本品评得一无是处。他说到私小说。私小说，一般都视之为方丈记、徒然草系统的日本文学传统在末期自然主义文学之中的苏生，他却大大咧咧地抢白：自然主义的“自我”是西方概念，私小说的源泉并不在于传统的日本文学，本质上笼罩着西方文学的影响。“成为日本文学中心性类型的私小说使日本人精神生活沙漠化”，“从私小说里感受到日本的传统，是因为没理解日本传统，这正是日本文学的悲剧”。

让西方人从东亚当中把日本分得清，是强其所难。但作为东亚人，特别是老子天下第一的中国人，对日本可就总是指指点点了。日本文化主要由外来文化结构。所谓外来文化，来到了日本，就化作日本文化的部分，不能因“外来”二字而当它游离于本体之处。外来文化之于日本，绝不是随便披上一件衣服，而是当饭菜吃，或许一开始饥不择食，狼吞虎咽，但下肚之后便是消化与吸收，排泻乃至拉肚子。日本式的“式”并非在荒海小岛上万世一系地土生土长。例如“和”，向来被举为最日本式的思维方式和生活准则，但追溯一下，便追到圣德太子的十七条宪法，而宪法又来自何处，似无须赘言。倘若让德川时代的学者来说，中国人没理解本国之教中的道德，倒是日本人极具道德性。曾参与《大汉和辞典》编纂的原田种成说过：“培育日本人精神生活或伦理观的，是《论语》《孟子》等古典。但战后轻视汉文教育，以致日本人伦理观淡薄，国语混乱。过去的学者用汉文论说，借

汉诗吐露胸怀。汉文能力欠如，就不能读解思想或历史的资料，荒谬的研究横行。”

日本何曾像有人说的那样，“轻易地脱掉了中国文化这件穿了千余年的旧衣服”来着？拿汉字来说，甚至有人把吃了败仗也归罪于它，咬碎钢牙，却终于不能脱下随手一丢。正因为脱它不下，才在“独自”上大做文章。如果外来文化只不过是衣服而已，一下子脱掉，那日本可就只剩下兜裆布了，就像“祭”时常见的，男人们赤身裸体，只一条兜裆布系在胯下。再如果一下，如果能穿脱自如，玩外来文化于股掌之上，那么，日本才真是“以表层文化的万变来维持核心文化的不变”。走笔至此，忽然想起赖山阳的女弟子江马细香的诗句：“爷翻欧兰书，儿读唐宋句，分此一灯光，源流各自溯。”这幅生动的日本文化图，早了点儿，是幕府时代末期的，但接着画下来，可就是明治维新了。

日本人有日本人的豁达，拿来人家的文化，从不计较叫“洋火”还是叫“火柴”，坦然把“汉”字视若自家园子里长的。不脸红，不怕手，大张旗鼓，明火执仗，从不遮遮掩掩，所以才让你走在东京街头，能到处指认中国文化或西方文化，三下五除二就“比较”出一篇博士论文来。不过，你说那东西或文化是你的吗？却已经比你的更实用，更精致，更程式，更莫名其妙，“穿西装竟比西洋人还要地道”。奈何人们好“纯粹”，因而“杂种”的日本文化总有点里外不是人。但只要你不别有用心，不追根问底，那日本文化就大放异彩了。相扑、茶道、生鱼（若想起潮州菜，叫鱼生）等，不地地道道是日本文化么？半导体并非日本人的发明，甚至传闻是从美国偷来的，但日本拿它来立国，谁能说日本不成其为日本了呢？

当然，犹抱琵琶半遮面也大有人在。最玄乎其玄的是“言灵”之说。说什么日语中有其他语言所没有的“灵”，所以学起